

中国农村研究·区域政治系列



DIFANGSHEHUI ZHENGFU YU JINGJI FAZHAN

地方社会、政府与 经济发展

——对福建南部一座县级市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贺东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区域政治系列



DIFANGSHEHUI ZHENGFU YU JINGJI FAZHAN

地方社会、政府与 经济发展

——对福建南部一座县级市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贺东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对福建南部一座县级市的政治
社会学考察 / 贺东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04-9877-3

I . ①地… II . ①贺… III . ①区域经济发展 - 研究 - 晋江市
②社会发展 - 研究 - 晋江市 IV . ①F127. 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339 号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 21 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 2000 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志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 委 会
2005 年 5 月

总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是一个世界农民最多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变的发展中大国。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20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进入21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将存在，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大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广阔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人员就致力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1990年前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1992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5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专著。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一套10本）。21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乡村治理书系”。2005年，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

我们撰写、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目标有四个：一是观察、记录、研究中国农村的变革历史；二是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三是挖掘和培育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四是建设中国农村研究学者交流对话的平台，特别是为学者们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建构既能够解释中国农村，又能够解释世界农村的分析框架提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鉴于这个目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经验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实证研究见长，过去以定性经验研究为主，近几年随着“百村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的建设，计量实证研究也开始起步。“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经验性成果既包括田野调查成果，也包括在历史的“田野”中调查的成果；既包括定性经验研究，也包括定量经验研究；既包括案例研究，也包括计量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基地，以研究农村政治问题为主，同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期望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解剖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认识。因此，“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也烙上了跨学科的烙印，不仅出版的成果具有多学科的特点，而且大多数成果打破了学科壁垒，跨越了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中心成果的展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走过20年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实际、实证、实验，即“三实”研究风格。中心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从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转向自为阶段、从理论建构的洞察力阶段转向概念化阶段、从粗放式研究阶段转向精致化研究的阶段。“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集中展示中心及其学者的转型研究和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具有发展性和持续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著作为主，同时吸纳优秀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中国农村研究”丛书能够变成中国农村研究学者、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话的平台。丛书将在中心“三实”的宗旨的指导下，长期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的优秀实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两类主要的系列丛书。“中国农村调查”丛书包括四个子系列：一是中国农村调查·名村系列；二是中国农村调查·名人系列；三是中国农村调查·调查报告系列；四是中国农村调查·咨询报告系列。“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中心的两类姊妹丛书，前者以学理为主，后者以应用为主；前者以个案研究和计量研究为主，后

者以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为主；前者立足实践，但超越实践，后者立足实践，也服务实践。

作为学者，作为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理论抱负，希望通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撰写、出版，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的成长，同时在研究发展中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

徐勇

2010年5月12日于华师桂子山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关于选题和实地调查的准备情况	(1)
第二节 以往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
第三节 理论说明	(10)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5)
第五节 关于资料的说明	(27)
第六节 本书的框架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	(30)

上篇 地方社会与“晋江模式”的生成

第一章 历史视野下的商工文化与地方社会民间经济的发展	(37)
第一节 自然环境、人口演变与行政区划的变动	(37)
第二节 地方传统社会与商工文化生长的历史考察	(46)
第三节 民间经济的重挫与重新发韧	(54)
第二章 家族制度与晋江民间企业的创业	(70)
第一节 闽南家族组织制度的演变与特征	(71)
第二节 家族制度的复兴与晋江民间企业的创业	(74)
第三节 晋江家族式企业的特点	(83)
第四节 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理论的思考	(86)
第三章 侨乡社会经济结构与海外晋江人的作用	(89)
第一节 侨乡社会的形成	(89)
第二节 海外—乡土关系的重建与地方经济发展	(97)
第三节 海外晋江人与地方公共事业	(107)

下篇 地方政府与“晋江模式”的变化

第四章 第一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政治庇护”	(113)
第一节 地方政府与晋江民营经济的发轫期	(113)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扩展	(117)
第三节 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	(126)
第四节 第一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行为特点及解释	(134)
第五章 第二次创业时期政府职能的扩张与地方国家构建	(138)
第一节 发展引起的变化与挑战	(139)
第二节 经济建设中的政府业务量与活动范围	(150)
第三节 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业务量与活动范围	(171)
第四节 二次创业时期的机构增加、人员扩充、职能强化	(179)
第五节 地方治理的制度化与理性化	(192)
第六章 二次创业时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	(198)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及特征	(198)
第二节 企业主精英与城市行业同业组织发展	(201)
第三节 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建构	(214)
第七章 结语	(220)
第一节 从“晋江模式”到“新晋江模式”	(220)
第二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226)
第三节 从“新晋江模式”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235)
附录 晋江大事记（1913—2011）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83)

图表索引

表 1—1	泉州历代人口统计表（唐至民国）	(39)
表 1—2	晋江历年人口统计表（1949—1987）	(41)
表 1—3	晋泉地区历史上几次人口户数表	(48)
表 1—4	1958—1978 年晋江工业产值表	(59)
表 3—1	1947—1948 年由厦门出入国境的福建 华侨人数统计表	(91)
表 3—2	1949 年前华侨对晋江投资情况表	(95)
表 3—3	1953—1995 晋江人出境目的地变化表	(96)
表 3—4	晋江市“三来一补”合同数及工缴费收入表	(100)
表 4—1	1978—1984 年民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121)
表 4—2	1986 年国内主要报刊对晋江的报道	(127)
表 5—1	1980—1991 年晋江县（市）三次产业比重变化	(140)
表 5—2	1993—1995 年晋江市市场硬体建设情况表	(158)
表 5—3	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控制一览表	(166)
表 5—4	晋江生产总值、财经收入与社会事业支出比较	(173)
表 5—5	2001—2005 年社会事业支出年增长率	(173)
表 5—6	晋江市各级党、政、人大机构（含某些 国企单位）表	(182)
表 5—7	1991 及 2004 年晋江行政干部简况对比	(185)
表 5—8	1993—2001 年晋江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表	(189)
表 5—9	1992—2008 年晋江历届市委书记、市长一览表	(193)
图 5—1	干部任命流程图	(194)
表 6—1	晋江市部分行业协会、同业公会表	(202)
表 6—2	晋江制鞋工业协会主要会员表	(203)

导 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晋江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人瞩目，引起了中外学者的特别关注，被视作“晋江模式”或“晋江现象”进行研究，并取得很多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叉透视，剖析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趋势，揭示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政府—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些关系和特征，并通过选取地方层次（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来描绘现代国家是如何成长起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提出一些新看法。

在导论部分，我拟作如下几个方面介绍：选题和实地调查、学界已有成果的简述、几种基本思路、研究现状的不足，提出写作本书的构想和期望解决的问题，进而说明要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理论及研究方法，以及本书所涉及的基本资料，最后是对本书中出现的有关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关于选题和实地调查的准备情况

这个选题是我的长期研究兴趣所在，早在1997年读硕士期间，我曾跟随一个课题组到晋江作过田野调查，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以晋江民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2000年，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后，决定继续将晋江作为调查地点。2001年初，晋江市政府邀请我参加一项联合调研活动，我又重新进入“现场”，这也是我开始从事博士论文写作的第一次实地调查。此后六年期间，我先后二十多次在晋江进行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

在调查过程中，当地政府、企业及民间组织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协助。需要说明一下，我在晋江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大学期间的两位同学是晋江人，而且他们都在政府相关部门担任了要职，为我提供过许多实际的帮助。这一切是我“进入现场”不可或缺的机缘和条件，事实上，我

的这项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关系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才得以顺利完成的。

由于这项研究工作持续进行了六年多，这一时期，我先后获得了厦门大学博士学位和完成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我经常将观察到的心得和我的博士导师戴一峰教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徐勇教授沟通。例如，我原以为靠民间力量自我发展的晋江经济会昙花一现，但却发现近几年晋江的经济依然后劲十足，在全国百强县（市）的排名不断往前。我想搞清楚晋江模式运行轨迹是否有了变化，戴老师强调指出：要从政府—社会—经济三者关系的视角来透视晋江模式的运行机制。徐老师也为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尤其是先生提出要注意研究闽南地区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为闽南地区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因素，开阔了我的理论视野。在两位导师的启发下，我的一些模糊看法明晰起来，对这个选题更有信心，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思路。

第二节 以往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有关“晋江模式”的研究至今有 20 年的历史，研究者们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学术环境以及自身所受的学术训练的影响，在观念与方法上各有不同。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晋江就因它的“地下黑工厂”、弃农经商受到各方面的注意。^①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晋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 1981 年到 1985 年，晋江的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一直是福建省的两倍以上，引起广泛关注。1985 年下半年“假药案”曝光后，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1986 年费孝通在对中国四个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道路作对比时，首次使用了“晋江模式”。^② 这以后，不少学者都对“晋江模式”（或称“泉州模式”）的发展道路、特征作了分析。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来自党校系统学者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

^① 1976 年在全国广泛播出的纪录片《铁证如山》，就是在晋江石狮拍摄的。

^② 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8 页。

代，福建省委党校有一批教研人员，长期以来对晋江的发展十分关注，经常深入晋江市进行调查研究，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如林道周的《“晋江模式”发展战略初析》，伍长南的《“晋江模式”初探》，戴锦福、叶廉溪的《晋江乡镇企业模式初探》，林春今、陈冬、范圣任的《“泉州模式”探索》，^①林锦明的《论“晋江模式”》^②，魏子熹的《晋江模式》。1987年至1989年，该校又先后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进行调查，参与撰写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晋江卷》的专著。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对“晋江模式”来不及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研究，因而还没有出现有分量的成果，而且这种讨论大多是围绕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展开，如晋江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否有利于城乡的分工和农业的稳定发展等。

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关于“晋江模式”的研究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曾沉寂了一段。“晋江模式”研究热的重新出现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从1992年至1996年，出现了研究“晋江模式”的四本专著：《晋江模式研究》、《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晋江精神探索》、《晋江的实践与启示——农村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③上述研究成果大都出自党校系统学者之手。

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几位主要学者关于“晋江模式”的主要观点：

陆学艺在《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一文中认为，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①找到了一条正确符合市情的发展道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②有一个以市委为核心的好的领导班子。③有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晋江精神。④有一个

^① 福建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福建省首届乡镇企业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1987年3月。

^② 《福建论坛》1987年第1期。

^③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晋江市委政策研究室主编：《晋江模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黄陵东、陈一放、欧孟秋：《晋江精神探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魏子熹、傅家栋、施永康、陈文亮：《晋江的实践与启示——农村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明确的奋斗目标。^①魏子熹在《晋江模式》文章中认为：①利用侨资，靠“三闲”起步。②以市场机制为主。③有一支庞大的社会供销员队伍。^②罗涵光认为，是一股“内涵于广大晋江侨属中的蕴蓄深厚的拓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这种力量是不可阻遏的”^③。黄陵东、陈一放、欧孟秋则试图从文化视角探寻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动因，认为“由于它（指晋江）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磨砺薰濡，使其在传统的形态中就孕育有并不断积淀着现代的和开放的先进品格”^④。

总的来说，上述学者对“晋江模式”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还存在如下局限：

首先，他们的说明只是对具体事实的记述，而不是利用研究方法建立分析模型或者运用理论框架来探讨事件的发生原因，与社会科学要求通过理论预测事件发展方向的目的不一致，具有学术价值的建树甚少。

其次，套用某些政策性话语和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如《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一书中说：“10多年，他们（指晋江）从学习人家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及时利用本地优势，以‘三闲’起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以联户办企业为主的晋江模式，逐渐走到全国前列。”^⑤事实上，据我在晋江从事调查所了解，晋江并非先“包产到户”再“办企业”。晋江人搞联户办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兴起了，他们利用“三闲”或走私积累的资金在晋江境内办起了为数很多的地下黑工厂，到80年代初期推行“包产到户”时，联户办企业已经随处可见。在投资工业的利润明显高过种田的示范下，许多农民并不热衷种田，“转包”现象频频出现。这一事实正好和该书所说的相反。这些学者往往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以及各地对政策执行的不平衡性，只囿于注经式的研究路数，或满足于重复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

再次，不少研究只是谈一些经济常识，缺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晋江模式”，这使得研究只在同一水平上重复。然而，对“晋江模式”这一对象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对晋江原有的社会结构的考察，这就

① 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② 福建省委党校主编：《晋江模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0页。

③ 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59页。

④ 裴思：《晋江精神探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⑤ 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需要我们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加以研究，勾勒出“晋江模式”的机制。比如大家都注意到晋江经济在发展初期，大多数的企业是以“联户办”为特征，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合股人、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类企业的运行特征，如管理、交易等，就会发现传统亲缘网络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成果缺乏细微化的基础研究，也即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该区域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个案研究应构成我们研究的重要基础，它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并积累了丰富的个案研究经验。只有深入细致地分析这些案例，才能如实地揭示晋江模式的内在机理。

除了上述来自党校系统的学者外，另有一批来自各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来解释晋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因。如 20 世纪 90 年代人类学者王铭铭到晋江做田野调查，他的博士论文是以晋江金井镇塘东村为个案，讨论了传统关系（如亲族关系互相集资）在晋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则在晋江西滨镇跃进村做调查，探讨不同关系类型对晋江经济生活的意义，他发现了朋友这种后致性社会关系网在当地有极其突出的位置。^② 两人的观点各不相同，张其仔认为这是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相异造成的。^③ 折晓叶博士在晋江磁灶镇岭畔村从事“超级村庄的兴起与新型城乡关系”课题的研究时，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晋江出现了不少产值过亿乃至过十亿的发达村庄（她称之为“超级村庄”）。工业和企业制度不仅进入了这个村庄，而且在村庄扎住了根。在这个村庄工业化与自然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并没有彻底消失，反而对新引进的企业制度具有了适应力，在村社区基础上造就出了一种新的非农社会经济结构。村社区的经济组织采用现代集团公司的模式，不再以本社区为边界，而是迅速向村庄以外扩展，其经济的触角已经伸向城市甚至海外。同时，在这个

①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01 页。

②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③ 同上。

村庄已经形成稳定的可用于村政和公益事业的“村财”收入，具有了初步的“准政府”的村政结构和职能，如经济的、仲裁的、村政的、福利保障的结构和职能。^①拙文《晋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1970年代至1990年代》，以晋江的陈埭、英林、青阳、磁灶、安海为调查点，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晋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特点，指出商工文化、家族制度及侨乡社会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晋江模式的生成，但对晋江模式的变化及地方政府在其间所起作用的变化没有论述。^②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一些研究晋江模式的学者在理论建构和研究视角方面有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突破。如陆学艺在他主编的《晋江模式新发展》中，就认为以前的研究重点关注县域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流动、阶层关系的变化，而如今则将调研范围延伸到晋江的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即对晋江近三十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全过程进行总结和概括。他认为，晋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突出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企互动特色。黄陵东将“晋江模式”的新变化定位为内发外向、科学发展、和谐共享。他在该书中认为，“晋江创造的内发外向的发展模式与晋江地方党委和政府与众不同的积极作为是息息相关的，即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历届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创造条件，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实践主题始终是“放权、保护、服务”，并针对具体实际有所侧重，逐步周全。贺东航认为，晋江模式是融合“政府主导建构型”和“自主内生型”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理论界和官方所推崇的“小政府一大社会”格局并没有出现，而实际演变为“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格局，认为现行政府仍处在构建和扩张中。^④

我在做“晋江模式”研究的回顾时，也非常注意学界对“温州模式”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另外三个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珠江、苏南、温州

^① 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

^② 贺东航：《晋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1970年代至1990年代》，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③ 黄陵东：《内发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④ 贺东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

中，以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和“晋江模式”极为相像，这两个模式不像珠江模式^①和苏南模式^②在肯定中推进，而是依靠民间自发的力量顽强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③ 在这里，有两位学者对温州模式的研究，需要特别提一下：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晓毅在《从温州模式到二次创业——地方社会、经济与政府》一文中提到在“第二次创业中，政府不再像温州模式发展的初期那样放任自流，而是要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④。“政府推动的第二次创业，试图通过政府更直接地进入经济领域，从而推动温州经济有更大的发展。”^⑤ 王晓毅的观察与我在晋江所观察到的变化相吻合，不过王的文章只是简略地描述了这种变化，并未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展开来讨论。

另一位是李正男，他在《中国转型期乡镇企业发展中地方政府作用的研究——以温州与苏南地区为例》一文中，指出温州的地方政府在双轨制时期起着类似于管理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作用，鼓励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到二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转变为与东亚国家类似的发展作用，比双轨制时期更加积极地干预地区经济。原因在于：“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温州地区的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支柱产业不明显、布局过于分散、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趋于严重，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逐步下滑。于是，地方政府提出了以培养和振兴支柱产业、以骨干企业为核心的企业规模化经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企业布局合理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战略。运用财政手段，一方面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行政控制手段，大力推行以支柱产业中的重点骨干企业为中心的企业规模化经营，努力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并通过建设工业小区，推进企业布局合理化。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出面开

① “珠江模式”是以引进外资（港资）、内外合作为主要特征。

② “苏南模式”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导。

③ 温州的发展方式，尤其是初期，并未像乡镇企业与特区模式一样受到官方的鼓励，相反屡遭打击（譬如柳市的“八大王”事件），官意与民意经历了“顶牛、放羊、赛马”三个阶段。

④ 王晓毅：《从温州模式到二次创业——地方社会、经济与政府》，载《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张厚义、明立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⑤ 同上书，第360页。